



世纪文库

汉文学史纲要

(外一种)

鲁迅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鲁迅撰. —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1.8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5325-6013-4

I. ①汉… II. ①鲁…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3255 号

责任编辑 王冰鸿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

鲁迅 撰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9.5

插 页 4

字 数 133,000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6013-4/I·2394

定 价 19.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前 言

鲁迅有几项没有完成的写作计划，《中国文学史》是其中之一。留下一部教学讲义，题为《汉文学史纲要》。他的讲演记录《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魏晋文学的演变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实际上也具有文学史性质。另外，鲁迅在一些短篇文章里，从不同角度谈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各种问题的看法。本书就是将上述内容汇集在一起编成的。

关于《汉文学史纲要》的书名，需要作些解释。1926年下半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为此编写了一份讲义，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似有匹配之意）。此讲义留有完整的手稿和油印本，共十篇，从《自文字至文章》到《司马相如与司马迁》。1927年3月1日至4月中旬，鲁迅在中山大学再次开设此课（因故中断），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鲁迅全集》时，编者将此讲义改名为《汉文学史纲要》，1981年版《鲁迅全集》沿袭了这一名称。

这里有一个问题：所谓“古代汉文学史”，此处“古代”是指狭义上的古代即汉以前的时代呢，还是指广义上的古代？所谓“汉”是指汉朝呢，还是指汉族或汉语？郑振铎显然将这一名称理解为“古代汉族

(或汉语)的文学史”，他于1958年发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虽然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却是杰出的。首先，他是第一个人在文学史上关怀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的。他没有像所有以前写中国文学史的人那样，把汉语文学的发展史称为‘中国文学史’。在‘汉文学史’这个名称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在作这样的理解时，把“古代”二字省略掉当然也是可以的。而郑氏正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人之一，所以《汉文学史纲要》的定名很可能出于他的建议。然而鲁迅讲义的内容却正如郑振铎上文所说，“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所以很可能“古代汉文学史”只是指古代和汉代的文学史，而并无郑氏后来所阐释的那种深意。倘如此，则“古代”二字就不能省略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将本书的名称回改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又有人主张仍用鲁迅最初所定的名称《中国文学史略》，我觉得后一种方法可能更清楚些；况且，1938年版《鲁迅全集》又正是根据鲁迅以此定名的手稿排印的，在版本学的意义上也更合乎规矩。至于我们这里仍以《汉文学史纲要》为名，则是遵从目前的惯例，以免引起普通读者理解上的混乱。

作为文学史来看，鲁迅此书是部未完稿，他自己是不满意的。1926年12月19日致沈兼士信中，鲁迅说到“文学史稿编制太草率”，“挂漏滋多”，打算“稍积岁月”，加以“修正”。鲁迅的话当然不只是自谦而已，但在中国人开始撰写文学史不久的上世纪20年代，这部仅编写到西汉武帝时代的简略讲义，仍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其中许多看法对后来的文学史编写者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从清末到“五四”前后，是一个怀疑精神盛行、传统学术受冲击很严重的时期。康有为的“春秋公羊学”说起来是走今文经学的路子，“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之正”，实际上为了达到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不惜随意抹杀经典文本的历史价值。他好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对于促进疑古思潮起了很大作用。“五四”前后，在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刺激下，对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不信任态度更有进一步上升

的态势，顾颉刚把禹当作一条虫，可以算是一个特具形象感的例证，而类似的情况别有若干。在文学史领域，胡适的《国语文学史》（1922 年有石印、油印本，后由黎锦熙改订增补，于 1927 年排印出版，是为《白话文学史》的前身），对整个中国文学作一种“二分法”的基本判断——模仿的古文传统史与创造的白话文学史，认为前者是“死文学”的历史，后者才是“活文学”的历史，从而一笔勾销了大量传诵久远的作品的存在权利。胡适的出发点是为了抬高白话文的价值，建立其文学“正宗”地位，为此他同样不惜动摇传统学术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变化的那一时代，上述情况的出现当然各有其充分的理由，其历史意义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过于偏激的，或主要为实际政治及社会目标服务的学术主张，对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必然有它的弊害。这样再来看鲁迅会觉得很有意思。毫无疑问，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其倡导白话文也堪称不遗余力。但在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时，我们发现他具有一种相当稳健的态度；在尊重历史文献和学术传统、讲求考实的前提下融通新思想、新方法，是他努力的目标。对以前的文学史，鲁迅评价较高而又多次加以推荐的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两书都是以材料丰富见长，观点却比较平实。或许在鲁迅看来，平实即便不值得满足，却也是一部学术著作首要的品质。鲁迅自己出版得较早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 至 1925）固然带有很大的创新性，但体例和评述其实是谨严的，而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学史略》即《汉文学史纲要》，也反映着同样的学术取向。

《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章《自文字至文章》论文学的起源，由“原始之民”以姿态声音传情说到言辞歌咏的产生，继而由巫覡的歌舞赞颂说到文字的发明与运用，继而从初始之文说到“文章”的概念，一直到晋宋“文”、“笔”之分辨，极简赅地描述了中国文学生成的历史。在这里作者运用了源于西方的艺术起源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却几乎不显痕迹，因为用以描述和论证的材料，完全出于中国古籍。这种中国文

献与西方理论的结合，在当时是值得钦佩的尝试。还有第八章《藩国的文术》涉及《玉台新咏》题为枚乘作的九首五言诗(其中八首被选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略有保留的情况下将其视为枚乘所作，这一处理在当时的氛围中可算是很特别的。不过现在想起来，鲁迅这样做道理也很简单：《玉台新咏》是载录这些诗的早出文献，它和《文选》的处理虽不同，但也没有彼此不相容的冲突。在没有可靠根据能够推翻这种记载时，作为早出文献的《玉台新咏》是值得信从的。关于“古诗”作者问题的争议延续了很多年，一度梁启超等人根据诗中思想情感来推断其为东汉中后期作品的看法占据了上风，现在对此示反对的人又逐渐多起来，因为这种说法在文献学上是没有根据的。这也就是向鲁迅所遵循的原则回归。

《汉文学史纲要》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很多，特别是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趣味，譬如他好楚辞、好庄子、好司马迁，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评司马迁与《史记》：“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其精当和精彩使人难忘。上面所说传统学术精神与新思想新方法的融合，只是论其一端，不过这一端也是很重要的吧。

要论名气，题目很长又有点儿怪怪味道的讲演录《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知道和读过的人恐怕更多些。这次讲演作于1927年7月23日、26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暑期学术演讲会上，文章题下注“九月间”三字，实有误。

鲁迅爱好魏晋思想文化及人物，是广为人知的。他的学生孙伏园在回忆文中写到，五四时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云：“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谓其爱好尼采、托尔斯泰之学说，而文章则颇得魏晋风神熏染，“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而于魏晋人物中，鲁迅又对嵇康情有独钟，他曾费心劳神校勘《嵇康集》达十余遍，并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跋》、《〈嵇康集〉

考》等专文，这在鲁迅是独一无二的。研究者和他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或有互为渗透、彼此印证的情形，那么鲁迅从嵇康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某种特异的精神隐象了吧？譬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促中小心”即心胸狭窄，而借以表达一种峻厉而不能容忍污秽的个性，想必鲁迅是有会于心的。

对魏晋的历史文献鲁迅早是了然于胸，对魏晋人物他也每有情感上的互通，而在作这场讲演时，正当国共分裂、历史发生剧变的关头，谈及魏晋文人的生存处境，很多现实的感受便会涌上心头，正如作者后来在致友人中信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所以这一场讲演做得非常特别。

在梳理这段历史，描绘魏晋文化变化的过程时，鲁迅显得十分从容和随意，他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拈出一些例子，略加解析，彼此绾连，就勾勒出清晰的历史图景。他用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四个词归纳魏晋文章的特质，不仅令人感到准确，而且也能从中体会到鲁迅本人的文学趣味。

而当说到魏晋文人在变乱时代中的处境和心理，鲁迅的分析往往会一层层地透入人物的内心深处，说出他们真正的痛苦。这时读者所感受到的智慧，是被浓郁的莫名的哀伤所浸染了的。我们且拿下面一节做例子：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的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褒黜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

至于反对礼教。

这样谈论历史的时候，在鲁迅眼前浮起的显然是历史与现实相互重叠的影子。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即使在鲁迅的集子里也可以算是难得的佳作。它通过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来描绘一个转折性时代的文学演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却又说得那么轻松；它的语言始终很幽默，但这幽默其实包涵着很不相同的情调。它是那样有魅力，以致让王瑶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随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时，特地撰写了三篇论文也是三本书——《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来展示自己由此中衍化出来的新成果，这三本书如今也已成为名作。

骆玉明

2005年6月

目录

前言 / 骆玉明 /1

汉文学史纲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1

第二篇 书与诗 /5

第三篇 老庄 /12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17

第五篇 李斯 /23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25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28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31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36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4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7

附录

《古小说钩沉》序 /60

谢沈《后汉书》序 /61

《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62

- 《吕超墓志铭》跋 /63
-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65
- 《嵇康集》序 /73
-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75
- 《小说旧闻钞》序言 /76
-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77
- 《绛洞花主》小引 /81
- 《唐宋传奇集》序例 /82
- 流氓的变迁 /85
-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87
-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89
- 谈金圣叹 /91
- 二丑艺术 /93
- 《北平笺谱》序 /95
- 选本 /97
- 论“旧形式的采用” /100
- 算账 /103
- 脸谱臆测 /105
-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107
- 隐士 /108
-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110
- 从帮忙到扯淡 /112
- “题未定”草(六至九) /114
-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127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寢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只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复有巫覡，职在通神，盛为歌舞，以祈灵貺，而赞颂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广大。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狃獠，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吕不韦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郑玄则谓“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谱序》）虽荒古无文，并难征信，而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固当以吕氏所言，为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特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离，其事随讫。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法，今不能知；书契者，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

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辞》）“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故许慎复以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许慎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了，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说文解字序》）指事象形会意为形体之事，形声假借为声音之事，转注者，训诂之事也。虞夏书契，今不可见，峋嵝禹书，伪造不足论，商周以来，则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汉，文字弥繁，而摄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结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鱣魴鰪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

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降及轩辕，遂多传说，逮于虞夏，乃有箸于简策之文传于今。

巫史非诗人，其职虽止于传事，然厥初亦凭口耳，虑有愆误，则练句协音，以便记诵。文字既作，固无愆误之虞矣，而简策繁重，书削为劳，故复当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今所传有黄帝《道言》（见《吕氏春秋》），《金人铭》（《说苑》），颉项《丹书》（《大戴礼记》），帝咎《政语》（《贾谊新书》），虽并出秦汉人书，不足凭信，而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则殆犹古之道也。

由前言更推度之，则初始之文，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箸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文心雕龙·原道》），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绮，林籁泉韵，俱为文章。其说汗漫，不可审理。稍隘之义，则《易》有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可知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至刘熙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

《说文》又有𠄎字，云：“𠄎也”；“𠄎，𠄎彰也”。盖即此义。然后来不用，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

刘勰虽于《原道》一篇，以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而晋宋以来，文笔之辨又甚峻。其《总术篇》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所论，尤为昭晰，曰：“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曰，“笔，退则非谓成

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脣吻遒会，精灵荡摇。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金楼子·立言篇》）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之笔。

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清阮元作《文言说》，其子福又作《文笔对》，复昭古谊，而其说亦不行。

第二篇

书与诗

《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中。“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王充《论衡·须颂篇》）或曰：“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纬书谓“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尚书璇玑铃》）乃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尚书》盖本百篇：《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今本有序，相传孔子所为，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然亦难信，以其文不类也。秦燔烧经籍，济南伏生抱书藏山中，又失之。汉兴，景帝使晁错往从口授，而伏生旋老死，仅得自《尧典》至《秦誓》二十八篇；故汉人尝以拟二十八宿。

《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其文质朴，亦诘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晋卫宏则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故难解之处多有，今即略录《尧典》中语，以见